

中国廉政史鉴

思想理论卷
⑤



李洪峰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廉政史鉴

李洪峰题



思想理论卷
⑤

李洪峰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廉政史鉴. 思想理论卷 / 李洪峰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39-4771-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廉政建设—历史—中国

②廉政建设—政治思想史—中国 IV. ①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4051号

中国廉政史鉴 (思想理论卷)

主 编 李洪峰

特约编审 张圣洁

责任编辑 斯 日 程晓红 潘 艳

装帧设计 王子原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353

字 数 40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71-1

定 价 2880.00元 (共三卷十六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第十二章 近代廉政思想

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斩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中国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起来，政治危机日益加重。面对此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软弱无能，越来越不能担负保卫与建设国家的任务，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以权谋私日见横行，造成中国越来越腐败的政局。

究其危局与病态的主要缘由，一是中华民族落伍于时代，封建专制制度及其选官择吏体制已经陈腐不堪；二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为官谋私达到极致，价值观、权力观严重扭曲；三是清正官员虽然竭力讲究传统的道德修养，力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越来越显得无力回天，于世无补。因此，进步

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全体人民群众的廉洁政治诉求越来越强烈，在体制、制度和文化上进行革新，治疗、预防和反对腐败，建设清明政治，选用称职官吏，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文明，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先进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

中国近代反腐倡廉、谋求政治清明的思想与活动，是全民族、全社会追求复兴和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大致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与实践斗争的演进和主题相吻合，分成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上的廉政思想理论建设都有其特色。纵观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窥见中华民族追求政治进步的历史浪潮。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敏锐地察觉到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和封疆大吏也感同身受。这些人形成了近代史上的“变法派”。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共同的思想在于，他们都认识到清政府面临危局。其突出的表现：最直观的层面，就是吏治腐败，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深层次的则是社会风气不正，所谓“人心泰侈、风俗游荡”。如果说前者揭露了官场与官制的弊端，后者则涉及对传统文化缺陷的剖析与批判。

龚自珍是近代最先端的社会批评者。他认为清政府已临衰世，应当立即“更法”。他把希望寄托在打破僵化的官秩来起用士人以振作政治方面，呼吁要养士、用士；而士人则要加强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要植根正义和历史趋势，敢于离群脱俗。龚自珍有三点思想堪称深刻：一是发现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其结果必然是全社会的萎靡不振；二是指出了人性本无善恶，善恶为后天养成，从而为教化致善提供了人性论依

据；三是学风要转变，要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开创了近代变革的风气之先。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廉政勤政官员最光辉的典型。廉洁家风和家教养育了他良好的从政作风，他的大公无私、勤奋谨慎、亲民爱民一直成为美谈。人们铭记他虎门销烟的壮举，也常常玩味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作为清朝封疆大吏，政务庞杂，日理万机，他专门论述廉政的文章几乎没有，只是在处理政务之间、举手投足之中，闪现他执政为民、清廉自矢的形象。这或许是大多数清官的共同之处。

魏源是讲求廉政的地方官员代表。他认为“中饱旁蠹集团”是腐蚀社会健康肌体的毒瘤，对于社会腐败要实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魏源的反腐思想核心集中在“德治”、“教化”和“用人”等传统主题方面。他提出对君对民都要有一种赤子情怀、忧患之心、节俭作风、求是态度；要勇于纳言听谏，防止壅闭成痼；要约束不良嗜好，防止上行下效；要慎重交友，防止污于小人等等。魏源提出“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对于改变和扭转中国由来已久的慕古心理定式和尚古贤政情结意义匪浅，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革新派官员。

太平天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同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样，它是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并且它把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理想推向了极致。所不同的是，这次农民运动又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它是通过拜上帝教组织的。拜上帝教是西方基督教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杂糅形成的粗陋形态的宗教。它打起天父上帝的旗号，号召人们起义，建立“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的新世界，具有几分神

秘。这对身处在传统文化中的老百姓来说，既有贴近的一面，又有疏离的一面。从理论上、文化上讲，太平天国试图超越传统文化，但是没有超越成功，所以，定都天京之后，这一运动一反往日的纪律严明、团结奋斗、浴血奋战而变得争权夺利、追逐享受、腐败堕落，俨然一个复辟没落的封建王朝，以致酿成“天京事变”那样的内讧，高级领导成员相互猜忌和残杀，终至衰亡。但是，就廉政而言，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非一团漆黑。据考证，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非常之难能可贵。最重要的是在“天京事变”后，洪仁玕完成《资政新篇》，这是很好的复兴纲领，在刷新政治方面提出移风易俗、加强法制建设、察失用人乃至简化文风等举措，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太平天国就失败了。

太平天国的兴起，促进了地主阶级“中兴派”的崛起。在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舞台上，以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扮演着挽狂澜于既倒的自强角色。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王韬、郑观应、冯桂芬为代表的一些早期维新派人士认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从经济到文化乃至政治制度都要学习。洋务派在思想上虽没有他们那么开放，但是在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其实践却深入得多。目睹晚清政府在太平军起义中飘摇欲坠的事实，他们悟出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创办洋务，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救朝廷，也就是救国家。在文化观念上，自强中兴派却是相当的传统。他们自身倡导推行是廉政，却没有认识到廉政建设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上有所革新、有所创造的道理。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官员典范。他秉承“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的人生信条，一生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军、为政各个方面，克己勤勉，孜孜不倦。他一生中有一天不监察自己、教训自己。躬身自省，克己复礼，防微杜渐，循规蹈矩，是曾国藩秉持廉洁最大的特点。鉴于此，梁启超感慨道：“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清史稿》主修赵尔巽称曾国藩标行立世，“以忠诚倡天下”，“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左宗棠大器晚成，成为办洋务、反侵略的一代名臣。左宗棠性情豪爽，做事雷厉风行。作为地方官，他裁撤陋规，查办贪官污吏，革除官场积习，所谓“澄叙官方，以廉为本”。作为军事统帅，他倡端廉，明纪律，杜冒领。他特别重视对于廉吏的劝勉提拔，亲自上折为之请奏。虽然他并不是理论家，但是他有许多非常深刻的政治观点，显现出他思想的卓越。左宗棠还提出了“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浹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这样的官员为政之道，真乃儒家民本社稷思想的绝佳应用。

张之洞是科举取仕的成功者。他早年跻身清流，养成抨击贪腐的个性，有“青牛角”之称。外派地方大员之后，他不仅清节自持，而且以肃清官场为职志。他裁撤公费馈赠，裁减冗官闲员，对时政多所补救。他把官员的廉政勤政提高到攸关世道兴衰的高度，认为扭转世情人心，关键要“共砥官廉”。对于除弊之才，他以诚相待，委以重任，而自己则“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他无所恋”。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最高统治者如惊弓之鸟，张

之洞则慷慨陈辞，为“变通政治”出谋划策。他痛斥社会虚糜，提倡勤俭节约；批驳上下阶序森严，提倡疏导民情，打破常规起用人才，革除官场沉暮之气，而办事尤其要做到简要清通；剖析因俸禄过低而造成官员贪腐的事实，劝说朝廷厚俸养廉；揭露书吏、差役固结奸猾、为非作歹，指出必须严厉整治；全面解析刑狱腐败，提出九项包括学习西方法制经验的措施；对八旗的堕落、屯卫的虚浮、绿营的无用以及或转或裁或撤都一一指陈；就连行文、文风改革也提出了相应建议。即使在弥留之际，张之洞仍敦念“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但是，他的思想旗帜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的思想影响广泛久远，它既是维护晚清政府统治的文化方略，又是当时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一项意见，所谓“世运明晦，人才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因为如此，张之洞一再申明制度的变革要慎重推进，革新不可偏激。对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张之洞颇有微辞。他认为，人治也就是使用德才兼备的人治理国家，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属于中国国粹，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唯此才能保障政治清明、盛世迭出。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创痛巨深。除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顽固的政治势力之外，绝大多数政界人士人都认识到，中国制度和文化的的确到了不立即变革便没有出路的地步。于是“变法”与“革命”的大旗同时树立起来，这也当然分别被它们的服膺者认为是根治腐败的途径。

变法的倡导者是康有为。早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封建专制的不合时宜性和国人甘于淡泊、不思进取的劣根性，呼吁要予以变

通。后来，康有为进一步认识到，是中西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近代各自不同的命运：“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这种“政教之异”，必然导致中国的官员伪善和社会腐败。所以，康有为认为，外部危机的根源在于内部腐败。正因为认识比较深刻，康有为才把变法作为建设良好政治和良好社会的途径。从官员作风、官僚制度、政治体制、社会风俗，都在他设定的变革范围内。康有为呼吁激励工艺之学，以促进文化创新，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解放思想作用。但是，也还是因为本身思想根本没有突破旧有传统文化的窠臼，旧有文化、制度强大的惰性和排异力量最终扼杀了新的政治主张，并且使康有为等自己复归旧的文化营垒。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成为保皇派的领袖和提倡将孔学立为国教的旗手，固守着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日新”“维新”、三世递进和道德修养、人治教化的资源，以此来号召革新，以达救治社会制度整体腐败这样一种越来越僵化、逐渐成封闭的思路。

梁启超是在康有为的引导下走上投身变法的道路的，在变法失败前二人联称为“康梁”，实际上梁启超在政治上是康有为的追随者。但是，变法失败后两人的思想逐渐分歧，梁启超一度倾向于革命。从资料上看，与康有为相比较，梁启超了解西方思想要深入得多。他倡导政治清明的一系列主张，例如，启用报纸新闻监督，提倡法制建设，指出大众文化的教化功能，很多是借助西方文化的成果。而且，尽管梁启超对曾国藩这样的传统文化典范称颂有加，但是，他的确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照于政治文明的瑕疵，并对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他指出，中国政治注

意防弊由来已久，对民众使用驯服、奴役、欺骗和监督的统治手段，造成了国民恭顺、矫伪、愚昧、狭隘的品格，此种国民性何能形成政治清明？梁启超对中国国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性质进行了剖析，指出长于私德修养，欠缺公德公利之心，使得中国人对公务漠不关心，少数人的腐败才得以肆意妄行，政治文明难以进展。所以，对于当时中国的民众，梁启超借成立政闻社之际，发出四项政治呼吁：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立足批判传统文化，梁启超指出，中国人把科学看低了，把科学看呆了，缺乏求真、求系统、求实证的知识与方法，结果形成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思想病症，何以言公共政治生活健康开展？所以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补救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治标不如治本，在文化上进行矫正，才是根除腐败的根本之策。梁启超揭示的这种政治文化变革，在逻辑上必然意味着一场政治革命在所难免。

严复也积极呼吁变法，尤其是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取仕“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批评社会风尚“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他指责官僚集团愚昧、自大、保守、贪婪、自私；他把希望寄托于新式学校培养出的新人，因此寄望于新式教育。严复认为，新式教育要开发民智民权，树立新的国民精神；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天下为公的国民情怀；要加强实业教育，重视专业业务教育，使教育摆脱仅为选官之路；要强化“乐”的教育，陶冶美的道德情操。严复认为学术要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服务，否则就会使学业无济于世，造成人才浪费、民族衰亡；而只有学习新文化，培养新型劳动者，才能杜绝各种腐败现象。严复思想西化成

分较重，在政治上支持民主自由变法，但是秉承渐进主义立场。他认为时下“代议”民主制可以医治政治腐败，前提是议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切实能够代民言事，因此，不认同激进主义的革命为当务之急。而且，他主张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作为立国精神；要兴起良好的社会风俗，又要建设良好的法律法制，通过美俗良法，建设清明政治。所有这些，都有中西结合的文化意义。

为了救治腐败呼吁变法，变法不成，继而投身革命，这或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仁人志士与时俱进的思想行为轨迹。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因为参与戊戌维新被通缉而避难台湾岛和日本，1900年剪发辫立志革命。因苏报案蹲监狱，与蔡元培筹建光复会，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为革命摇旗呐喊，矢志于民国筹建，遭袁世凯幽禁，支持护国护法运动，反对老、新军阀，赞助抗日救亡，耿介一生，不屈不挠，时人评之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章太炎个性极为突出，可以说是孤标傲世，在反腐败抗流俗方面，有感而发。他认为高洁之士要敢于抵抗污习恶俗，不怕被孤立，要以这种大独精神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和历史进步之中。章太炎是晚清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为商鞅翻案，倡导以法治国，因为“中国之弱于欧美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相反之至大者，则曰中国人治，欧美法治”。章太炎较早就具有反满意志，这不仅仅是因为清朝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在于他看到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与虚伪。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指陈：“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

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鉴于“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的社会现实，他进而提出，革命者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道德境界，加强自身修养，达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这样的道德评价，都是以“无害”于他人为底线的。以阶级的分析方法而论，章太炎反对资本主义发展，否定代议制，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而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可以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中，是以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参加革命的。

邹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1903年就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写成《革命军》一书，系统阐述了民主革命观，提出了“中华共和国”二十五政纲，系统地阐发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被章太炎誉为“义师先声”。邹容鲜明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也是民主革命的宣言书，他还参与了华兴会、同盟会的创建，成为革命先驱。他的思想深刻之处在于，深入到了国民性层次来透视腐败症结，对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他说：“中国的人最可耻的，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切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国家有难，与我何干？”“做官的只晓得贪财爱宝，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想科名，其余一切的事都不管。上中下三等的人，天良丧尽，廉耻全无……大家若不从此另换心肠，痛加改悔，恐怕不要洋人来灭，也要自己灭种了。”作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认识到中国腐败衰弱是全社会性的，逻辑结论必然是，

不仅要进行制度变革，而且要进行文化变革。

依据地位和作用而论，黄兴生前是仅次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长期在国外为革命奔走呼号，黄兴在国内则直接投入了武装起义。相对而言，孙中山以理论见长，黄兴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在与孙中山相处的过程中，黄兴面对不同的意见，尊重、克制，淡泊名利，揖让以礼，恪守“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在维护领导集团的团结方面，胸怀宽阔，为人厚重，高风亮节。辛亥革命之后组建民国，黄兴等待孙中山就任总统一事最为典型。甫一建国，黄兴通电民国各级官员：“我中华民国方奠定初基，凡我同胞，均宜将旧染之污涤除净尽，乃能享共和之国，而见人道之尊。……今与诸公约：嗣后倘有假公名以遂私图者共摒弃之。我等仍当力求振作，互相规箴，勿使满清末造之积习再见于近日。”他认为：“非有高尚之学术、卓越之精神、优美之道德，不足竟全功而巩新国。”他告诫各军士：“务望我军人各革其心，各爱其身，各守区域，各尽责任，勿以无安扞而自惊，勿以有助劳而自足，勿攘夺私利而操同室干戈，勿把持财产而蹙中央之命，勿遗同志之耻，勿动全国之愤。”在任南京留守期间，黄兴敦促各军精诚团结，不树党派，执法从事，整肃纪律，晓谕署内一切设施，概从简约；用人行政，务求实际，以前乾修诸名目，理应一律铲除。黄兴鞠躬尽瘁、勤政廉政，树立了一个民主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要创立者，是三民主义的提出者、阐释者，是中华民国的建构者，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也寄希望于清廷中的达官贵人推行领导集团的自我变革以重新焕

发中国的活力，甚至还寄望于教育救国。但是，这些探索由于社会腐败至深毫无效应，才使他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根源于一点，“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也就是政治腐败，而救治腐败只有政治的、社会的革命一途。

孙中山有许多光辉的廉政思想，例如，清明的政治和健康的社会要立足于保障民生的治理观，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的人生观，以党的主义治国的政治理念，尽瘁国是、不治家产的无私精神，等等，非常丰富。但是，作为力图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先锋领袖，孙中山防治腐败的思想与根本措施还是在于图谋建立新制度，具体的就是“权能分治”、“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先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或者“民权”）和“治权”两部分。他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政权，即民权，在孙中山思想中包括国民有选举、罢免官吏之权，有创制、复决法案之权这样四种权力。同样，孙中山把“治权”即“能”，分成五个部分，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分别由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五个机关来行使。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就能够“造就万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权能分治”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它坚持了国民主权原则，这是此前立宪派、改良派所不具备的新思想。它主张政府权力来自国民授予，国民通过宪法，把各种治权分别授予不同

的国家机关行使；国民则保留“民权”，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来控制 and 指挥“治权”的行使，由此促使这些行使治权的主体兢兢业业为国民服务，做好国民的公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皇权、官僚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政治方向。民权政府的“五权分立”，是从欧美国家的“三权分立”演化而来的，但他认为：“将国外的规制和本国原有的规制，融合起来，较为完善。”“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至于考试制度、选拔人才，他认为更具有中国特色，这种制度“最为公允”，“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因此，孙中山融合中西政治思想文化，创立了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理想和政治体制，并且把建设廉洁政治的举措推向了近代最高峰。

步入近代，中国专制政体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了，自然是腐败的与孕育腐败的政治制度，必须革除。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具有人治型、礼治型、伦理型的基本特征，集威权主义、民本主义、精英主义于一体，对应着中国社会的君主—士大夫—民众这样的社会结构。民众的读书人经过科举取士进入仕途，为君主管理国家。这样的文化与制度适应于农业社会，到了近代则显示出其落后性。晚清政府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在政治上是反近代化，尽管在经济上企图近代化。因此，它的作为统治支柱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试图恢复历史上的贤明君臣共治局面，而新的社会力量则力图使中国政治文明与时俱进。这是历史演进中的保守与进取的较量。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重教化、重人才、重修养的

有益成分，并没有丧失其合理性，因此，在文化与制度的变革中，被发掘、被弘扬、被赏识，成为值得吸收利用的文化元素。这是文化博弈的结果。从专制政体到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龚自珍、魏源到曾国藩、张之洞，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最后到孙中山、黄兴，变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深入；文化上的变革相应而生，但是，最终都没有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近代廉政诉求反映出来的明显现象——封建制度要革除，传统文化则要扬弃和转型，这就是结论。

第一节 龚自珍

【人物简介】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璚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龚自珍宦海生涯坎坷短暂，但是，力主士人匡救时弊，倡导读书人要“通经致用”，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梁启超后来评价道：“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盦。”提倡“更法”、“改图”，批评清王朝的腐朽，洋溢爱国热情，对后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王佩诤校订的《龚自珍全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龚自珍全集》。